

发达地区农村的家庭代际关系及其解释

——基于无锡调查的讨论

陈柏峰¹

【摘要】：在无锡农村，多代同堂的家庭模式较为普遍，它有着双系并重的发展趋势；家庭代际关系呈现出不平衡、交换单向高强度、紧张程度低等特征。在区域差异视野中加入时间和空间维度，有助于描述和解释这种家庭代际关系。无锡是发达地区农村的典型，很早就实现了在地工业化，形成了独特的时间观念和空间布局。农民已经广泛接受现代工业时间，老年人可以在工商企业找到工作机会，将一切可能的时间转换为经济收益，从而实现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家庭也会做好代际分工，让时间有最大效益。同时，村庄空间的封闭性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父代与子代可以共同居住，情感支持有空间基础，村庄集体可以为改善老年人状况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村庄公共空间有助于维护良好的代际关系。

【关键词】：农村；代际关系；区域差异；时间；空间

过去十多年，我们到全国各地农村调查发现，不同地区农村的家庭代际关系有着巨大差异。我们对各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做了很多描述、分析和解释，主要理论视角是区域差异的视角，它从不同地区村庄社会结构切入，兼顾影响村庄社会结构差异的地区传统文化、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等区域性因素。2018年7月，我们一行30余人在无锡的两个乡镇做了一个月的驻村调研，获取了包括村庄社会结构、家庭代际关系在内的关于无锡农村的经验质感和丰富材料。无锡农村社会结构是原子化的，按照从村庄社会结构切入的区域差异理论视角，其家庭代际关系与华中、东北农村类似，代际交换不平衡、代际关系紧张。然而，田野调查发现，无锡农村的家庭代际关系呈现出不平衡、交换单向高强度、紧张程度低等特征。既有区域差异的视角不足以有效解释。无锡农村是中国最早实现在地工业化的地区，是发达地区农村的典型，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时间观念和空间布局，在区域差异视野中加入时间和空间维度，可能较有解释力。因此，本文以田野调研获取的经验质感和材料为基础，从时间和空间视角出发，对无锡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进行描述和解释。

家庭结构是代际关系的基础，无锡农村的家庭结构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多代同堂的家庭模式。由于无锡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比较严格，因此从三十到四十岁这一代人，独生子女是普遍现象。同时，由于宅基地管理非常严格，农民家庭分家缺乏物质（宅基地）基础，家庭结构主要以四代或三代直系为主，呈现出“2+2+2+1”、“2+2+2”或“2+2+1”三种模式。第一代由于年老，逐渐退出劳动领域；第二代人正值壮年，是家庭收入的主要创造者，是家庭事务的决策者；第三代是刚结婚或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家庭责任承担也不多；第四代是未成年人。二是父系和母系“双系并重”的发展趋势。传统家庭生活中，“父子轴结构”^①是基础，代际关系、亲属关系都围绕父子轴展开，加上从夫居的习俗，人们在亲属关系、社会关系上都以父系为主。而在无锡农村，目前母系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两头走”^②的婚姻形式和“两家并一家”的新习俗。男女两性在父母养老安排、财产继承上呈现平等化局面，夫妻关系趋于平衡化，而姻亲关系的地位在逐渐提升，从夫居、随父姓的习俗都在改变。

一 家庭代际关系中的父代投入

¹作者简介：陈柏峰，男，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法治保障研究”（项目编号：16ZDA062）。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②一些学者在其他地区发现并研究过这一现象，参见王会、狄金华：《“两头走”：双独子女婚后家庭居住的新模式》，《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

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制度安排和代际关系维系，在交换维度主要体现在亲子抚养、赡养老人、财产继承等方面。在多代同堂的家庭模式和双系并重的发展趋势下，这些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既与全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有着类似的趋势，也有其特别之处。

（一）父代对子代婚姻的经济投入

无锡农村十分重视结婚，结婚是一个家庭的大事情，是父母人生的重要任务。父母很早就开始为小孩将来婚嫁准备费用。新桥村的姚大爷在访谈中说：“孩子结婚是大事，一辈子只有一次，肯定要好好准备。我们很早就开始给孩子准备结婚的费用，大家都是这样的，而且别人都看着呢！”父母很早就给子女结婚做好了准备，等到子女进入适婚年龄，就开始张罗着给他们介绍对象。在当地，年轻人一般就近求学，就近找工作。当地有很多企业，年轻人不需要出去打工，大部分年轻人选择在家乡及附近工作。这样，父母就可以天天催促他们结婚，给他们安排好结婚的一切。

父母操办子女的婚事，有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在无锡，高额彩礼是普遍现象。一场婚事操办下来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虽然当地经济发展较好，村民收入相对于中西部农村较高，但真正对此毫无压力的富裕之家毕竟是少数。鹅湖村妇女主任王某，其儿子结婚花费在百万元左右。杨家里村王大妈的儿子 2015 年结婚，没有盖新房也没有买房，小两口与父母住在一起，花费接近 40 万元。在子女婚事的经济压力下，很多村民只能借钱操办。与我们之前在其它发达地区农村的调研类似，各种婚丧嫁娶等仪式性人情场合按照富裕之家的标准操办，几乎成为村庄的办事标准，这种标准超出了一般村民的承受能力，成为富裕阶层才玩得起的游戏。富裕村民在推动婚姻负担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一些老板，经济条件好，子女结婚大操大办，彩礼和嫁妆动则几十万、上百万，一般村民因此不得不跟风提高。

在父系和母系双系并重的趋势下，结婚时不仅男方花费大，女方也有不少支出。结婚过程中，男方支付给女方的彩礼，一般并不是由女方父母据为己有。女方一般要在彩礼的基础上，另外加钱带到男方。这些钱最终归小夫妻所有。如果女方家庭动了彩礼钱，街坊四邻就会说他们是“卖女儿”。在婚礼仪式中，有一个叫作“开箱”的仪式，男方的亲属和乡邻会在新郎新娘楼下等着主家洒喜糖，并围观新娘打开从家里带来的行李箱，行李箱里装的都是女方的嫁妆。如果箱子里的现金相对于彩礼没有增多反而减少，新娘就会“抬不起头来”。女方在丈夫家里的地位多少受到嫁妆的影响。家庭条件较好的女孩，家里人给的嫁妆既有车又有房，她在夫家的地位自然就高。例如，蒋塘坝村王奶奶的孙女 2016 年出嫁时，嫁妆是无锡市郊的一套房子和一辆车。

显然，婚姻负担重的原因之一是彩礼高，目前一般达到了 15.8 万元或 18.8 万元。而且，彩礼的本质是财富在代际之间的转移，彩礼是新脱离父代的子代家庭的经济基础。这倒是与全国其它一些地区的情况类似，彩礼成为“代际剥削”的工具^③。彩礼在无锡农村，能够“顺利”成为代际剥削的工具，有其地方性特点。苏南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早，1976 年无锡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力度大，执行效果好。1980 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由于当地的乡镇企业发展早，大多数劳动力都去工厂打工，缺乏照看小孩的精力，很快接受了独生子女政策。在此条件下，女方家庭没有必要“截留”彩礼。在中西部地区，很多家庭“截留”女儿的彩礼，往往用于儿子结婚。由于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造成男青年之间激烈竞争，“彩礼”是衡量男青年家庭实力的重要指标；而且，由于中西部多兄弟家庭多，兄弟间为了争夺父母的财产，会伙同女方索要高额的彩礼，也有一些家庭通过女儿出嫁索要彩礼来支持儿子提高婚姻能力。

婚礼宴席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一场婚礼，宴请的花费多在 10 万到 20 万。婚嫁的宴请一般前后持续三天时间，村民大多会选择在村里举办。也有村民选择在酒店里举办婚礼，只在婚礼当天的中午和晚上宴请，经济条件好的也可能连续三天在酒店宴请。宴请餐数多，造成花费不少。一般家庭在镇里的酒店宴请，花费多在 20 万左右。当地有些村民对此十分反感但又无可奈何。相比之下，房子上倒是没有太大的压力。家境较好的可以在镇里或者外地买房，一般都是按揭买房。家境不好的村民，一家三代人住在村里。

^③①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5 页。

(二) 父代对子代小家庭的经济支持

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农民的三件大事是盖房子、为儿子娶媳妇、抱孙子。在无锡农村，人们的责任感似乎更加深厚。在子女结婚后，父母在物质方面对年轻小夫妻给予补贴，一旦有了孙子女，还会承担起照顾小孩的责任，承担孙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大部分开销，甚至承担子女小家庭的各种生活负担。由于子女的工作较忙，大部分家庭选择由父辈承担对孙辈的照顾责任，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带孩子的情况十分常见。同时，在人情开支方面，整个大家庭往往作为一个人情单位，老一辈亲戚相关的人情支出由父辈承担。

无锡经济发达，基本实现全民就业，生活也达到了小康水平。父母不需要依靠子女就能够自我养老，加上当地社会保障措施完善，父母本可以过着轻松、自在、安逸的晚年生活，为什么他们有强烈的意愿照顾子女小家庭，甘愿遭受不断延长的代际剥削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多代同堂的家庭模式有利于维持代际“剥削”。无锡农村以四代或三代直系家庭为主，呈现出“2+2+2+1”“2+2+2”或“2+2+1”三种模式。这种家庭结构以直系血亲为主，家庭形式稳定、家庭关系亲密。子女多是独生，没有其他人与其来分担将来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因此也就没有分家，父母与儿子的小家庭也不会分家。在家庭开销方面，小家庭有其独立性，管理着自己的财产，并不会将收入上交给父母管理。多数情况下，大家庭的吃穿用度，都由父母负责。父母也没有年轻人那么多消费需求。父母的生活以家庭为中心，所有的付出主要是为了让家庭变得更好。在遇到重大开支，例如小轿车、房屋等需求时，如果他们有能力，也愿意承担。这样的家庭结构，使家庭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年轻人过着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

第二，父辈的经济能力是代际“剥削”的基础。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企业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多，延长了村民的工作年龄，身体健康的70岁以下的老人可以继续工作，并不需要子辈支付生活费用。在村庄中，老年人继续工作是共识。村民们都说：“现在孩子的压力都比较大，我们不能闲在家里，要是能动就要去工作，多少挣一些钱。”我们在入户访谈时发现，白天在村里的几乎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身体健康的老年人都在工作，有的70多岁还在家干些彩印包装的工作。60岁以上70岁以下的老年人打工的年收入大概在3万元左右。由于有经济能力，父辈可以对子辈，甚至孙辈承担较大的经济责任。不少父母为了催促子女早些生小孩，甚至主动表态，小孩出生后的一切抚养费用都由自己承担。

第三，年轻一代的生活成本支出大是一个重要原因。受到村庄经济发展的影响，年轻人的生活模式与老一代越来越不同，生活成本不断显著提高，而他们的经济收入难以支撑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子辈难以承担对孙辈的抚养成本，具有经济能力的父辈依然需要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访谈中不少父母表示：“年轻人平时的工资收入还不够养活自己，肯定需要我们做父母的补贴啊！”同时，隔代抚育的方式与本地的工作模式也有关。中年人与年轻人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劳动力，如果他们对小孩的抚育和教育时间的花费增多，必然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减少，随之经济收入减少。为降低抚育后代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老年人选择牺牲自己的时间，让子女安心工作，主动承担抚育孙辈的责任。

二 家庭代际关系中的父代权益

显然，在家庭代际关系中，父辈对子辈的经济投入和经济支持不断增长。不过，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父代在家庭结构中的权力和利益并没有同步增长，反而有所缩减，从而表现出代际交换的不平衡性。

(一) 子代对父代的赡养责任

无锡农村老年人养老的资金，一般有三个可能的来源，自己的积蓄和退休金、政府的养老保险、子女的供给。因此，当地有三种养老模式，自我供养、政府养老、子女赡养。当然，这三种模式并不是完全排斥的，可以组合。例如，失地农民享有失地养老保险，同时有自己的积蓄，子女可能还会另外给钱供养。自我供养的家庭，老年人有自己工作的积蓄或退休金。有些老

人，甚至会拿出部分养老金补贴子女家庭。由于当地经济发展好，就业机会多，老年人愿意打工挣钱来实现自我养老。老六步村的王书记说：“这里的老人几乎不找子女要钱，他们每月有‘老人钱’，不够花就自己去打工。”

政府养老在当地主要指的是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金养老。失地养老保险金逐年提高，目前已经达到每人每月 800 多元，这对老年人而言，已经足够维持养老。一些仍然还在工作的老年人，每月的工资加上失地养老保险金，总收入甚至要比有些年轻人还高。在当地，大规模的征地拆迁项目主要是在 2000 年之后出现的，随着当地“双置换”模式推行达到顶峰。因此，农民所谓的“政府养老”，实际上是以土地为媒介实现的，是政府“土地换社保”计划实施的产物。这一养老模式开始的时间不长，而且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正如尚书苑社区梁主任讲的：“土地养老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养老形式，政府通过这种养老模式缓解了社会矛盾，并为最终实现职工养老保险做准备。”

子女赡养是传统的养老模式，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仍然采取这一养老模式。在无锡农村，也有部分老年人依靠子女支持养老。这些老人往往没有技术、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需要依赖子女赡养。不过他们一般还享有政府每个月 400 元左右的养老补贴。当地没有退休金和社保的村民，男性 60 岁以上、女性 55 岁以上，就可以每月领取养老补贴，这笔钱大体可以满足基本生活。因此，子女的赡养投入并不高，主要花在父母的医疗投入上。值得一提的是，在赡养方面，儿子与女儿并没有太大区别，这与双系并重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老人如果不能通过工作收入支持子女家庭，还可以通过帮做家务、带孙子女回馈。这种家计模式与中西部农村较为类似，父代与子代形成“年轻人主外、父母主内”的代际分工。在高度市场化的无锡农村，这种家庭分工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开支、赚取收入。

综合而言，与父辈对子女的代际投入和代际支持相比，无锡农村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几乎微不足道。当然，这也是全国农村的普遍情形。当地村民普遍认可这种状况，认为子代的赡养责任不大是完全正常的，认为父辈不能向子辈多要钱；子辈应该把钱主要花在对后代的养育，而不是对父辈的赡养中。在访谈中，多位老人提到“国家才是大儿子”，因为国家支付“老人钱”。由此可见，在无锡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不断弱化，子女的养老责任作为村庄共识也在弱化，而国家养老的观念在强化，领取养老补贴和养老保险金，正在成为村民对老年生活来源的预期。

（二）子代对父代的情感支持

虽然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父母在家庭中承担的各种责任大，在老年时得到的经济支持较为有限，但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还是普遍较好，家庭关系普遍较为融洽。多数老年人可以实现自我供养，但这并不意味着家里的晚辈不关心、照顾他们。在无锡农村，村民大多注重孝道。不少农民在访谈中说，每个人都有老的一天，与对子女的不断付出一样，孝敬老人也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老人曾经这样孝敬他们的父母，自己现在照顾老人，将来子女也要这样赡养自己。还有农民说，赡养老人是他们应该做且必须做好的事情，这直接或者通过“示范”的方式对将来子女赡养自己产生影响。

无锡农村的村集体企业发展较早，在集体企业转制之后，私营企业遍地开花，同时集体土地统一流转，继续耕种土地的村民不断减少，大部分村民都在离家不远的工厂工作，他们并未离开村庄生活，大部分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依然共同居住。一些家庭在镇上购买房屋后，由年轻夫妻居住，部分中年父母会与年轻夫妻共同居住在镇上的房屋内，一些年纪较大的老人可能不会到镇上与子女共同居住，而选择独自居住在村庄中。年轻人不排斥和老人一起居住，老人也乐意和年轻人住在一起，老人和子女之间很少出现争吵。即使由于工作、饮食习惯等原因不住在一起的家庭，子女也会“常回家看看”。老人和子女一起居住，帮子代带孩子、做饭等。代际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冲突较少，很少出现中西部地区的空巢老人或老年人自杀的现象，老年人自感生活较为幸福和充实。

显然，空间距离的接近促进了代际之间的情感。中西部农村拆迁上楼之后，一家人搬进单元房，居住空间拥挤，矛盾从而凸显。无锡农村则与此不同，大多居住在村宅之中，可以就地城镇化，居住空间拥挤程度不严重。父母主动承担起隔代抚养、教育孙子女的重任，帮子女分忧，并将此看作自身的一种责任与义务，促进了代际和谐。而且，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力度大，

如今适婚的年轻人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结婚以后，父母将全部心血放在独生子女及其小家庭上，不会出现几个兄弟的家庭父母“偏心”导致家庭不和睦，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感情联系特别紧密。

不过，虽然老年人对家庭的贡献较大，代际关系也较为和谐，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却有限。老年人管得多的事情，就是催子女结婚、婚后尽早生小孩。在此类事情上，由于父辈相对强大的经济能力和经济安排，干预能力还较强，年轻一辈也还比较听父辈的话。不过，结婚对象的选取，父母一般只会给建议，大都是尊重子女的意见。其他事情，老年人一般不会管，也不会有太多话语权。不少老年人说：“孩子的事不要多管，不要多说。”“儿子成了家后，你给钱支持他们可以，他们的事情不能多管，说多了他们烦。”老年人在家庭中话语权逐渐降低，与整个城镇化背景相关，社会形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老年人的经验在家庭生计中的作用有所弱化。

三 理解家庭代际关系的视角转换

无锡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第一，不平衡。在传统时代，子女受教育年限少，参加农业劳动比较早，可以较早回报父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是养老的唯一模式，且受到国家法律和村庄伦理保障。而目前无锡老年人对子女教育、婚姻、小家庭的各种经济投入和经济支持越来越高，赡养方面的标准不高，父母对子女的依赖并不高，因此代际关系是不平衡的。第二，交换单向高强度。传统时代的代际关系中，不仅父辈的付出较多，子辈“孝”的标准也比较高。无锡农村代际关系中，父辈的付出比传统时代更多，但子辈向父辈的回馈并不多，“孝”的标准并不高，代际关系的交换是单向高强度的。第三，代际之间的紧张程度低，代际关系较为和谐。传统时代家庭代际关系总体比较和谐，父辈权威高，代际之间日常互动频繁，关系亲密，较少代际间冲突与紧张。

无锡农村的家庭代际关系，呈现出不平衡、交换单向高强度、紧张程度低的特征。这与川西平原农村的平衡、交换强度低、紧张程度低的代际关系，两湖平原农村不平衡、交换强度高、紧张程度高的代际关系，华北平原农村不平衡、交换强度低、紧张程度高的代际关系，华南农村平衡、交换强度高、紧张程度低的代际关系^①，都有所不同。过去十多年，笔者到全国各地农村调查，发现不同地区农村的家庭代际关系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对各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所做描述、分析和解释时，主要理论视角是区域差异的视角。区域差异的视角，主要根据不同地区农村内部社会结构的差异作为分析切入点，兼顾影响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差异的地区传统文化、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等区域性特征^②。无锡农村的代际关系，仅按区域差异视角，难以得到完整理解。

在两湖平原农村，父母在子女婚姻中也有强烈的责任，结婚中的彩礼也很高^③。不过，这种对子女婚姻的高投入、高彩礼，并不是父代心甘情愿的付出，某种程度上源自女方的“勒索”。如果男方有多个兄弟，未嫁入的儿媳妇在结婚时就从男方父母那里得到更多财产，因此不断提高彩礼要价。有时在结婚之前，甚至迎娶之时还在提出要价，甚至出现过极端的例子，因要价谈崩而中止正在进行的结婚仪式，最后反目成仇。也有儿子与尚未嫁入的儿媳妇联手，从父母那里敲诈更多的彩礼的情况。安徽、东北地区的农村，代际关系表现出子代对父代的主动“剥削”，由于村庄内缺乏结构性力量而无法制约。父代由于对子代极端缺乏安全感，对未来儿子养老不放心，而开始蓄意积蓄。这些地区农村的代际关系因此表现出不平衡、紧张性高等特征。

无锡农村的村庄结构趋向原子化，这与两湖平原农村、安徽农村、东北农村较为类似，村庄内部缺乏内生性的结构性力量，既没有华南农村强有力的宗族和宗族认同，也没有华北平原农村的小亲族认同与行动。按照着眼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视角，这种地区人们生活预期短，不孝顺的行为缺乏村庄内部制约，家庭代际关系似乎应表现出不平衡、单向交换程度高、紧张程度高等特征。然而，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无锡农村的家庭代际关系虽然也不平衡，父代对子代的投入高，得到的回报低，但代际之间的紧张程度低，代际关系较为和谐。显然，从区域差异的视角去理解，从村庄内部社会结构及其背后的地区传统文化、

^①贺雪峰、郭俊霞：《试论农村代际关系的四个维度》，《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②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③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④范成杰、龚继红：《空间重组与农村代际关系变迁》，《青年研究》2015年第2期。

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等区域性特征出发，难以完整解释，无锡农村的家庭代际关系，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分析视角。

有学者曾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理解农村家庭代际关系^⑤，他们关注的农村地区主要以中西部村庄为经验模型。其实，时间与空间的视角，对于理解发达地区农村更为恰当，更有说服力。因为，在区域差异中加入时间和空间的视角，意味着将无锡农村的家庭代际关系置于城市化背景下。从其中相关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出发，可以对家庭代际关系的特征进行结构性理解。

苏南地区是最早工业化的农村地区，1970年代即有相当规模的乡镇集体企业，到199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体量巨大，成为当时全世界闻名的“苏南模式”，当地相当多的农民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实现了“工农互补”。199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苏南的乡镇集体企业变得不太适应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一些企业倒闭，一些企业进行了改制，成长为适应市场环境的现代企业。与此同时，苏南地区各县市开始大规模招商引资，因为良好的基础设施、区位优势，以及强有力的县乡村组织，在很短的时间内，各类企业大规模进入苏南农村，苏南农村进一步实现了工业化。乡镇企业改制后，尤其是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县乡村各级组织积极安排集体土地用于工业项目。如此，一方面苏南农村快速工业化；另一方面，县乡组织和村庄集体获得了巨额的土地租金收入。

可见，无锡的村庄有着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农民有大量的密集资源投入，由此带来超出村庄承接能力的非农就业机会，当地农民几乎全部实现了在地非农化；二是村集体有着稳定的土地租金收入，可以用于村庄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农民福利；三是村庄熟人社会形态得以一定程度的维系，没有陷入中西部地区农村空心化的命运。这些特征极大程度上塑造了村民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从时间上说，村民已经普遍走出农业时间观念，广泛接受了工业时间观念；从空间上讲，村庄传统上较为封闭的地缘空间在新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得以维持相当程度的封闭性，它与城市化的开放空间不同，与中西部地区村庄人财物不断外流的空间也不同。独特的时间观念和空间布局，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远远超过村庄内部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影响。

四 家庭代际关系的时间和空间解释

家庭代际关系特征，是在特定的村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被塑造的。在无锡农村这种发达地区农村，时间和空间因素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可能远超过村庄内部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从时间和空间的视角去理解无锡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现状。

（一）家庭代际关系的时间解释

从哲学上讲，时间是用来描述运动的，自然时间是对自然运动的描述，社会时间则是对社会运动的描述。自然运动过程由于没有人的参与而表现为一种纯粹客观性的自然时间，社会运动过程由于有人的参与而表现出具有主观性的社会时间^⑥。人类社会中的时间来自于社会生活，是非自然性的、社会性的、非人格性的。不同的社会结构蕴含不同的社会时间，社会时间是社会群体社会生活的节奏本身。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在农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基于农业生产特征的“社会时间”。影响农业社会时间的，虽然有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管理水平因素，但主要是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作物生长、成熟的生物学特性。因此，农业社会时间受动植物本身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支配而产生，它具有较强的节奏性、季节性和周期性。在农业社会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照动植物自然生长的节奏而劳作。动植物生长节奏使农业社会中一年的时间存在节日和节气，分为农忙和农闲。植物生长的规律下，翻地、播种、除草、收割等节点是农忙的时间，其它时间则属于农闲的时间。春种秋收既是自然规律，也是农业社会的时间格局。在农闲的时间，人们别无作为，不可能去催熟作物，必须耐心等待，等待的时间因此也是农业社会的娱乐时间。

^⑤①吴兰丽：《社会时间及其本体论表征解析》，《哲学研究》2016年第2期。

在农业社会时间中，人们的生活节奏是缓慢的，按照类似于动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抚养子女、等待子女的成长。由于农业社会中大量的人口并不接受教育，终生是文盲，因此子女成长过程中父母的教育投入并不高。当子女成长到生理成熟时期，父母就开始为他们的婚嫁操心。农业社会是匮乏社会，物质生活并不发达，即使富有阶层的消费也较为有限，整个社会的婚嫁成本以农业收入计算，总额不算太高，但也要耗尽一般家庭多年的收入积累。子女结婚后，就会开始生育下一代。父母老了之后，子女有义务赡养和回馈，这种义务得到儒家伦理的提倡，甚至得到村庄组织的强制执行。同样由于农业社会的物资匮乏、医疗条件有限，子女对父母的回馈也是较为有限的。父母生养子女一为子女成婚—子女赡养父母，世代代的代际关系都处在这个循环的轨道上。这种社会形态下，每代人的生养预期明确而循环，每一代人过着类似的生活，做着类似的事情。父生子，子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在这样的社会时间基础上，家庭代际之间建立起平衡的回馈、交换、平衡、和谐的代际关系模式。这种代际关系模式是“抚养—赡养”的反馈模式，是一种在时间上滞后的平衡。代际间关系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与此同时，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必须进行反馈。这一模式中，每一代根据生命周期，在幼儿时接受抚养，在青年时抚养下一代、赡养上一代，在老年时接受赡养。代际关系的平衡性在时间的滞后中实现。代际关系的相处，不是从理性计算出发，不计算即时的成本和收益，而是从亲情、伦理出发，成为每代人的生活习惯、每个村庄的生活习俗。

在苏南农村，工业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时间形态，当地几乎已经完全迈进了工业社会时间。工业社会的典型意象是工厂的机器流水线，工作人员在流水线上工作，必须有严格的时刻标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围绕工厂流水线展开，工人需要每日遵守严格的时刻，进入工厂厂房，按照时刻和时长进行作业，时间的时刻计算方式已经成为支配性的计时标准。工作时间、下班时间、节假日等，这些关于时间的制度构成了人们安排生活和行动的参照框架，这种框架虽然不是完全强制性的，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忽略，其影响力是巨大和广泛的，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约束。与工业社会时间相比，农业社会时间是模糊的，极为不精确，极为缺乏“时间”观念。

在工业社会形态下，不再有农忙和农闲之分，所有的日子都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日子都是可以用金钱计算。在工业时间的支配下生活，人们按小时、天、月领取报酬。苏南农村由于城市化较早，企业遍地开花，工厂星罗棋布，几代农民虽然居住在农村，做的却多是工厂工人的事，他们早就适应了工业时间，用工业时间安排生活、计算价值。所有的时间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可以很快兑现。这实际上为和谐的家庭代际关系奠定了经济基础。中西部农村，到一定的年龄如果不能外出打工，在村里能够挣的钱就非常有限，虽然时间可以用来做家务，但由于当地缺乏工商企业，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老年人的时间大多在消遣中度过，无法兑换为价值。老年人在家庭中的经济贡献相对较低。无锡农村则不同，老年人仍然可以通过在工商企业就业来获得报酬，虽然比当地年轻人低，但收入远高于中西部农村的老年人。老年人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大，中西部家庭代际关系中因赡养导致的纠纷和冲突几乎都不存在，家庭代际关系自然比中西部农村融洽和谐。

在时间兑现价值的驱动下，代际之间会协调好分工，以争取家庭的利益最大化。而且，由于家庭内部代际关系和谐，这种协调安排很容易达成。在工业化、市场化环境中，家庭中不同代的人不可能再像农业社会中过同样的生活，从事同样的工作了，不同代的人生活的成本、适合的工作都不一样，需要做出不同的安排。不同年龄的劳动力在市场中有不同的价值，由于处在经济活动的不同层次和领域，他们在市场中的消费需求也是不同的，整个家庭会据此计算家庭中不同代际的劳动力价值，并将之投放在合适的地方。因此，老年人也会外出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这种工作也许收入不高，但能保证他们同时照顾家庭，这样年轻的子女才能避免将过多时间用于照看小孩，以免影响他们获得工作的更高报酬。

（二）家庭代际关系的空间解释

空间是社会关系运作的基本条件，家庭关系在村庄社会空间中展开，因此受村庄社会空间的制约和影响。关于中国传统的村庄社会性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讲，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地方性的限制所导致的“熟人社会”成为对乡土社会的经典概括。“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

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的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围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①。

很显然，传统村庄社会空间是近乎封闭的，在人和土地两个面向上都是如此。村庄社会空间赖以存在的土地是恒定的，常态下变化不大。异常情况下地质条件变化可能改变村庄地理空间，但这毕竟过于罕见。土地交易也可能改变村庄地理空间，但考虑传统时代的诸多因素，土地改变村庄地理空间较为困难且改变不可能很大。第一是对祖先财产和守业的强调；第二是在土地交易中对出卖人权益的特别保护，尤其是出卖人享有几乎是不受限制的回赎权利；第三是对亲邻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在人的方面，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这是几乎没有流动的社会，社会流动被严格限制，人是附着于土地之上，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未离开过自己的村庄，日常活动范围也局限在周围几个村庄所形成的“基层市场区域”^②。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是常态，极个别官员和商人需要去外地，但外地永远只是驿站，人生最后还是要回归故里，即使在外地死亡，相隔千里灵柩也要回归故里、葬在祖坟上。

传统村庄社会中土地和人的固定性带来了空间的封闭性和空间隔离性，这为代际关系的平衡、和谐提供了空间保障。第一，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婚嫁、分家等人生历程，无论如何，成年后的儿子都与父母住在一起，即使不在同一屋檐下，也会在同一个村庄中，父代和子代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为养老提供了基础条件。农村养老的内容主要是平时供给粮食，生病时床前伺候，有事无事时问候，过节时团圆，住在一起，就可以照应。第二，村庄地理和人员的固定性，使得每个人的生活受到空间内各种规范的制约，较少的流动性使得任何人都很难跳出这些规范。儒家的孝道伦理规范经过几千年的浸润，早已进入村庄，内化为村庄共同遵守的规范。一旦有人违反，不养老敬老，必然受到村庄舆论的议论和指责。

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打工潮的兴起，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村庄社会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城市化进程也导致不少农民搬离村庄进入城市，村庄空心化成为普遍现象。与全国大多数地方不同，苏南村庄的社会空间的封闭性并未被彻底打破。由于苏南农村实现了在地工业化，当地有大量工商企业，农民不用出远门，可以在家门口打工，因此村庄空间布局没有完全分散。相反，由于几十年来当地政府对土地管理较为严格，村庄也没有空心化。虽然也有一些因素在打破村庄社会空间的边界，比如村民到市区购买商品房，大量外来人口在村庄租房，村庄公共舆论系统自然衰退等，但这些因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并没有完全打破村庄社会空间的边界。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确实增强了村庄人员的复杂性，但外来人员及其管理自成系统，并没有真正融入当地村庄社会。或者说，村庄社会中存在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二元系统，本地人的空间边界仍然具有较大的封闭性，尤其是与中西部村庄空间相比。同时，由于村集体有着稳定的收入，可以用于村庄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农民福利，增强了村庄的公共性，塑造了新的公共空间，使得村庄熟人社会形态得以维系。

这种空间结构对于维系平衡、单向交换强度高、紧张程度低的和谐代际关系，有着不可以忽略的影响。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空间上的分立，父代与子代难以共同居住相处，难以完成赡养过程，甚至一年才能有几天的见面时间，无法提供基本生活照顾和大病照顾。而在无锡农村，恰恰由于在地工业化，村庄空间独立性得以延续，父母与子女之间可以居住在一起，子女可以以类似于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赡养父母，对父母有情感支持。同时，由于空间的独立性没有被打破，加上村庄集体还能开展公共活动，村庄公共舆论空间尚存。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农民就地务工保留了完整的家庭结构，在村庄内维系与过去变化不大的人际关系交往，因此村民在村庄内生活的预期较长，城镇化还没有完全改变传统熟人社会的面貌。农民虽通过红白事的互帮互助，增强了联系的密度，这也有助于维系村庄舆论的效度。因此，村庄舆论还能一定程度上抑制违反孝道伦理的行为，维持良好的代际关系。这种社会舆论会导致了父母之间的攀比，父母竞争着要为子女办风风光光的婚礼，为自己的家庭争取面子。这种竞争和攀比，成为维系代际关系的单向交换程度高及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五 结语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②〔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本文从田野调研获取的经验质感和材料出发，关注了无锡村庄的社会结构，描述了无锡农村的家庭代际关系。从区域差异视角出发，无锡村庄的社会结构较为原子化，村庄内部缺乏结构性力量。根据既有的田野经验，这种类型村庄的家庭代际关系往往不平衡、冲突程度高。然而，无锡农村的家庭关系却呈现出不平衡、交换单向高强度、紧张程度低等特征。在区域差异视野中加入时间和空间维度，才能对无锡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特征做出有效理解。无锡是中国最早实现在地工业化的地区，是发达地区农村的典型，农民已经广泛接受现代工业时间。由于当地有规模巨大的工商企业，老年人可以在市场中找到工作机会，将一切可能的时间转换为经济收益，从而实现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家庭也会做好代际分工，让时间更好的兑现价值，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同样，由于无锡农村实现了在地工业化，村庄集体能够获得土地租金并用于发放老年人福利，农民可以在家门口进入工厂就业，村庄空间的封闭性和独立性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父母与子女可以居住在一起，代际情感支持有空间基础，村庄集体可以为改善老年人状况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村庄公共空间有助于维护良好的代际关系。

无锡农村在家庭代际关系方面有着很大启示意义。第一，代际关系、孝道等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经济基础的改良有助于促进代际关系的改善。无锡农村良好代际关系的维系，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独特在地工业化的时空所决定的。这种时空特性可能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在其它地方也可以实现，从而改善那些地方的家庭代际关系。第二，代际关系的普遍改良，可能需要依赖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了，就业市场扩大了，老年人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多的报酬，从而实现养老保障，获得独立性。即使在江汉平原这种代际关系非常紧张的农村地区，如果能实现在地工业化，老年人的状况和家庭代际关系也可能大大改善。第三，要改善农村代际关系，政府在养老政策上应当有更大的经济投入。目前，家庭养老模式不断弱化，子女的养老责任作为村庄共识也在弱化，而国家养老的观念在强化。政府在养老补贴和养老保险方面有更大投入，可以直接改善当下老年人的处境，并改善家庭代际关系。第四，村庄集体和公共空间的强化，有助于维持更好的家庭代际关系。有财力的村庄集体，可能为改善老年人状况提供经济投入和社会支持；良好的村庄公共空间，可以为家庭代际关系提供社会监督和保障。